

交叉与互构: 体育社会学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再生与范式拓展

熊 欢

(上海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 身体不仅是个人存在的体现,也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动态的重要载体。如何围绕“身体”这一核心维度,拓展甚至重构社会学的理论解释框架,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命题。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整合,系统梳理了体育社会学与身体社会学的交互演进,探讨了体育社会学如何突破身体社会学的理论盲区,实现理论再生产与范式拓展。研究指出,以“运动的主体”为理论核心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构建了一个整合微观实践与宏观结构的分析框架,使社会学理论从抽象命题转向具体实践,为理解社会动态机制提供了敏锐视角。此外,体育社会学拓展了身体研究的方法论谱系,包括反思性具身分析、民族志调查和实践干预,构建了经验性与批判性兼具的研究路径,为理解运动、身体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策略与工具。研究提出理论互构的路径:首先,确立“运动的主体”为连接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关键中介,打破自然与文化、生物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其次,通过体育参与者的身体叙事,揭示规训与反抗的复杂博弈,强调个体能动性的创造性;最后,建立“具身体验—运动惯习—社会结构”的多层级分析模型,实现身体社会学的范式拓展,并为未来跨学科研究与社会干预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身体社会学; 理论再生产; 运动惯习;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5)04-0013-13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0520.001

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体育经验研究融合的产物,自诞生以来历经了从边缘到中心、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历程^[1]。尽管学科不断发展,体育社会学在理论创新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未能有效突破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边界,对母学科的知识体系贡献也相对有限^[2]。相较于经济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等成熟分支,体育社会学仍处于学科积累的初级阶段,其理论创新能力和“反哺”母学科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3]。体育社会学需要通过关注体育运动的“具身性”(embodiment),超越宏大而抽象的社会分析框架^[3]。如何围绕“身体”这一核心维度,拓展甚至重构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命题^[2]。

身体社会学为体育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契机。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4]在《身体与社会》中确立身体社会学的学科范式,标志着“身体”成为理解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维度。在体育领域,身体既

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物质实体,又是重构文化意义的实践主体^[5],体育领域为身体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践场域和理论实验室,也为跨学科对话创造了可能。当前研究亟须回应两大理论命题:其一,当身体社会学遭遇具体的体育实践时,传统分析框架如何实现理论再生产?其二,体育社会学可以通过何种路径拓展身体研究的解释边界?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身体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交互演进脉络,结合体育社会学身体研究的经典文本与前沿成果,旨在探讨理论互构的路径,为以上命题提供解答。

1 从“缺席”到“在场”: 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沿革

1.1 社会学对身体的诠释

在社会学视域中,身体既被视为一种事物,也

收稿日期: 2025-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2AZD161)。

作者简介: 熊 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是一种文化符号^[5]。正如特纳^[4]所指出,身体是体验的极限环境,既表现为生命有机体,又是社会阐释的载体。社会学将身体分为外部性和内部性:外部性关注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现及控制,内部性涉及个体的人格、身份和自我概念,因此构成了“社会(society)—身体(body)—自我(self)”关系的分析框架。就社会学角度而言,身体、社会和自我相互支持,没有明显界限。社会提供资源并规范身体,同时身体的存在通过其肉体表现影响并塑造自我意识^[6]。社会学家认为,身体是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日常生活中身体不断被创造和表达。真正理解身体需通过以下3种方式:一是将身体置于日常社会实践中;二是视身体为承载社会意义和符号的系统;三是理解身体反映了社会的权力关系^[6]。因此,社会学延伸出3个层次的身体:个体的身体(体验的现象学意义)、社会身体(描述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政治身体(通过制度与法律规范的物质身体)^[7]。

1.2 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流派沿革及其观点

身体社会学的理论大体沿着“建构—体验—结构化”3条互相交织却又递进的脉络前行,并最终沉淀为当今学界普遍引用的3种典型立场^[8]:身体社会建构论、身体现象学、结构化理论的身体观。

1.2.1 身体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onism)——奠基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社会建构”(Constructionism)框架,以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视角,使身体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产物。身体经由话语、规训与文化实践“塑形”,而非单纯物质基础^[9],其含义随文化语境变化,受性别、种族与阶级等因素影响^[10]。

在建构主义者眼中,身体首先是承载社会意义的文化符号^[11],如让·吕克·南茜^[12]就强调,身体隐退于物质层面,是纯粹的符号。身体作为符号在互动中起主导作用,如鲍德里亚^[13]认为在消费社会中,身体被符号化为商品,成为价值交换的媒介。同时,身体是印象管理的工具,如戈夫曼^[14]阐释了个体如何通过身体表演塑造社会角色。

就权力视角而言,建构主义者更关注规训化的身体,这是指个体在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的约束下所形成的一种消极状态^[15]。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中用“政治解剖学”描述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强调身体作为社会权力规训的对象。他认为纪律通过物质和技术手段使身体变得顺从^[16],而当代“知识—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变得隐蔽。由于身体受到权力的操控、塑造与规训,权力的动态特性也导致身体呈现出不稳定性与可塑性。

就历史文化视角而言,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体既是历史的建构,也是历史进程的反映。如埃利亚斯^[17]的“身体文明化”理论强调身体是社会与个体关系的“摆渡”,是窥视社会文明的窗口。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社会逐渐开始控制身体暴力,迈向“文明”。他认为理性化使个体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而文明化则体现了对理想化身体的追求。在现代社会,理想化的身体成为自我救赎的象征,符合科学标准和社会审美,进而成为新的社会道德,即文明的核心。

无论是符号的身体、规训的身体还是文明化的身体,在建构主义视域下,身体作为一个抽象的社会构建,成为研究文化、知识、权力交织的重要分析框架,从而为探讨现代社会中个体与集体、自由与控制、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理论视角。

1.2.2 身体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Embodiment)——体验转向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现象学传统通过人类学家托马斯·乔达斯(Thomas Csordas)的引介,进入社会学视野。这一时期,身体研究从外在建构转向具身体验,强调“感觉—行动—认同”的连贯性,补充了建构论中相对缺失的主体维度^[18]。

现象学者认为,建构主义者对身体的理解往往依赖于既有的知识和符号,这使得身体被视为可操控的物质。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应该将身体活动置于日常生活情境中进行观察;认识身体的本质应在持续的行动与反应过程中进行^[19]。这一观点强调,个体的身体体验和行动是理解其思想的关键,而不仅仅依赖于语言符号。

在这一背景下,身体体验和行动成为现象学研究的焦点^[20],具身性(embodiment)研究由此兴起。它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中强调知觉、理智等精神现象与具体身体的紧密关系,认为人的认知基于具体的身体结构和活动^[21]。具身性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强调整体的身体观,认为人是有机体、意识、

情感和行动的统一体;第二,强调感官体验,具身性体现在肉体与感官关联的实践行为中;第三,关注社会关系与意义生成,具身是我们与他人和世界联系的基础,也是社会结构的背景与结果^[22]。尽管如此,身体现象学也面临着莱德所提出的“身体的缺席”^[23]的问题,即正常状态下身体往往“隐身”,只有在疾病或疼痛时,身体才成为关注的焦点^[24]。

1.2.3 结构化理论的身体观(structuration-oriented approaches)——整合尝试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身体实践逻辑”逐渐被用于弥合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二元分裂。该立场强调身体既是社会结构延续的“实践场”,也是能动主体通过惯习、情感与技术操作不断再造结构的“反馈回路”,从而形成结构化(structuration)的动态视角^[25]。

布迪厄则通过惯习(habitus)、场域(fields)和资本(capitals)等3个核心概念,解释了身体的结构化塑形。他认为惯习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性情倾向系统,肉身体现了社会与个人、客观与主观、结构与行动的联系。资本是权力,决定个人和群体的控制程度,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资本和象征资本^[26]。场域是社会空间中力量作用的场,主体在此争夺权力,通过经验获得资本以维持地位^[27]。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依赖,实践是它们在场域中的运作结果,这表明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并不对立。

布迪厄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特别关注作为价值符号载体的身体,把身体概括为一种文化资本形式。他考察了现代社会中身体被商品化的多种途径,认为身体不仅是交易的对象,还能生成更为综合性的资本形式,成为“积累资源不可或缺的因素”^[10]。身体的再生产和身体资本的转换体现了社会差异和身体资本的不等价交换。

综上所述,身体社会学从早期突出“外部塑形”的社会建构论,到强调“内在感知”的身体现象学,再到兼顾结构与能动的结构化视角,逐步形成了3种相对成熟而互补的理论立场。

1.3 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局限

尽管身体社会学成功摆脱了古典身心二元论,但其理论体系内部仍存在3条较为固化的思路,限制了对复杂身体现象的整体理解。

其一,结构决定论倾向难以解释身体主体性的突围现象。主流身体社会建构论深受福柯权力—知识谱系的影响,强调话语规训、社会制度和符号网络对肉身的塑造。该视角强化了结构对身体的单向决定性,使主体的创造性实践与能动反身性被系统性弱化。在此框架中,“突围”“抵抗”往往只能被描述为结构逻辑的旁支或例外,缺乏独立的理论空间,导致解释力停留在描述层面。

其二,具身性实践的空泛化。现象学转向将“lived body(生活的身体)”视为经验世界的根基,但在社会学移植过程中,第一人称体验常被抽象化为“整体感”“流动性”“在场”等模糊表述,缺乏可操作的概念分化与经验测量,使得“具身性”易流于修辞标识,难以揭示如“哪些感觉维度被社会化”“体验如何在交往中被编码”“主体何以通过身体感知介入意义生产”等具象化问题。造成了理论呼唤“经验”,却无法对经验作出精准的范畴化与机制性说明。在缺乏具体、多样化身体场景的支撑下,现象学强调的“lived body”概念易沦为抽象哲学思辨。

其三,跨学科解释力的碎片化。身体社会学向来侧重文化表征、话语分析与符号诠释,而对生物力学、神经认知科学、医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实证进展回应不足。“身体技术”在社会学语境中多被视为符号化身体的可见姿态,其深层的生理—技术耦合关系,如运动力学、感觉阈值调整、可穿戴传感技术等,则常被悬置。由此形成“硬科学数据—社会意义解读”二轨并行的知识结构,减弱了对当下数据化、技术化身体实践的整体把握,也妨碍了跨学科话语的深层整合。

总之,结构决定论的倾向、具身性概念的经验贫乏,以及跨学科解释力的碎片化,共同构成了身体社会学面临的发展瓶颈。要突破上述限制,理论需要同时引入主体能动性视角、采用细致深入的经验研究方法(如案例研究或民族志研究),以及实现理论与实践维度的深度互补。体育社会学为身体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以具体的运动场景、制度安排和技术装置为研究入口,能够有效整合行动者能动性、具身经验和实践知识3个核心要素进行分析,这为身体社会学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从而推动对“身体—社会—实践”关系的整体性再思考。

2 体育社会学对身体社会学的学科互涉、理论迁移与范式拓展

2.1 学科互涉:体育中“身体”研究的三重优势

体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port)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聚焦于“运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文化意义与主体性实践^[2]。在学科发展的早期(20世纪60至70年代),研究重心偏向体育制度、社会化和价值观传播^[28]。随着社会科学出现“身体转向”(the corporeal turn),体育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明确地将“身体”作为理论与分析的核心议题^[29]。与其他主流社会学相比,体育社会学直面的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有感知能力的身体实践主体,这为身体社会学研究提供了3重优势。

首先,体育场域中的权力运作具有高度可见性。福柯虽未直接探讨体育实践,但其“规训化身体”的概念在体育领域获得完美呈现——运动员的身体被视为“特殊的身体”,通过精确的技术规训系统(训练计划、竞技规则、监控技术)实现身体驯化与能力最大化^[30],体育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控制与规范身体的生产器械以及展示形体与其意志能力的场所。竞技体育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权力系统,涉及对身体的剥削和暴力^[31];政治和经济因素促使运动员滥用药物,体现了生物权对运动员身体的控制与压迫^[32];学校体育的纪律制度将身体作为控制对象^[33];而健身和休闲运动也强化了性别权力关系,推动个体在健身房内展现符合社会性别期望的行为和身体形象^[34]。这种身体的生产过程使福柯的“政治解剖学”从理论抽象转变为经验观察对象。

其次,体育实践为身体的双重性提供了具体证据。特纳提出的“我既拥有身体,又是身体”^[4]在体育运动中可得到完美诠释:运动员既将身体视为可训练、可改造的“工具”(having),又通过身体感知与技能实践体验自我的“存在”(being)。这种辩证关系在体育伤痛研究中尤为明显,霍伊(Howe)通过对运动员伤病的研究揭示:当身体痛感打破常规训练时,身体从“隐形工具”转变为“存在中心”^[35]。克罗斯利(Crossley)^[36]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运动通过增强个体对“我与世界”关系的身体控制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参与者“存之于世”的方式,使身体同时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与自我意识的

本体。

最后,体育空间提供了身体—社会交互的实验场。安德鲁·斯特拉桑(Andrew Strathern)^[7]提出的“个体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三层次分析模型在体育场域中形成流动整体,如健身房中的个体感受、群体规范与机构监管三者相互渗透,使身体成为社会关系的可视化中介^[37];泳池中复杂的身体—空间—权力关系形成典型的“身体三重性”示例:个体运动者通过水感练习建构身体主权(个体性),水下行为规范如泳道礼让和着装要求形成集体身体秩序(社会性),而泳池区域划分和安全监管机制则构成规训性监控系统(政治性)^[38]。这种三维互构使游泳空间成为理解现代社会身体控制与自由辩证关系的绝佳场所。

综上所述,体育中“身体”的“显现”不仅为观察社会身体提供了一个具象的场所,也为体育社会学与身体社会学理论互构奠定了基础。

2.2 理论的迁移与反哺:“身体”在体育社会学中的再诠释

2.2.1 身体建构论与规训逻辑的体育化转译

在社会理论的“身体转向”之后,体育世界迅速成为检验和丰富相关概念的最前线。大量研究因此围绕“运动的身体”(body in sport)展开^[3],对运动身体意义的建构、福柯的规训逻辑、消费主义身体观等核心范畴进行了情境化重写,并反向推动了身体社会学本身的修订与拓展。

首先,沿袭身体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体育社会学将运动身体视为一套被“符号生产—文化解码—主体领会”反复嵌套的意义机器:一方面,赛场规则、训练仪式、装备美学与媒体叙事共同为身体贴上“健康—自律—卓越”的标签,使之成为现代性与民族荣誉的可视载体^[32];另一方面,具体主体又在不同社会位置上把这些外部标签内化为可感知的“身体脚本”^[15],通过自我监控、仪式化训练和消费实践不断重写自身的性别形象、阶层品位与情感身份^[39]。正是在这一双向流动中,运动身体既承载了权力话语,也为个体提供了可操作的象征资源:男孩借助肌肉与力量追索“男子气概”^[40],女性则在拳击或滑板中探测“另类女孩”的身体范式^[41]。这种“符号—身体”循环说明,体育并非单纯的身体竞技,而是一个不断生产、交换和消费社会意义的文化

场域。由此,对运动身体的象征分析成为体育社会学进入权力—文化—主体三重议程的逻辑起点。

其次,福柯关于“规训化身体”的论述被直接移植到体育情境。现代竞技训练与学校体育通过计量仪器、镜面自检及医学监控,把训练场、课堂和健身房具体化为“全景监狱”式的微观权力装置^[42],使运动者的肉身在外目光与技术程序的持续追踪中被格式化为可测量、可比较、可纠正的“纪律机器”^[43]。这一外在规训揭示了体育制度如何将健康、力量与生产力作为政治秩序所需的身体资源。随着福柯“自我技术”思想的导入,体育研究的焦点由外部控制转向内部治理^[44]。心率带、体脂秤和运动App等数字装置,让参与者主动记录、评估并修正自己的训练指标,“健康”与“风险”因此被内化为自我监管的道德义务。换言之,体育场域呈现出一种被“快感”与“积极生活方式”话语包装的自我规训机制——主体在“自由选择”^[45]的旗帜下完成对权力规范的深度嵌入^[46]。

最后,消费主义话语把运动身体塑造成一项永无止境的改造工程,其运作逻辑大致呈现三重递进。消费文化首先通过“刺激—渴望”循环,将青春、活力与性感编码为可以购买的“形象资本”^[47]。在广告与社媒视觉的轰炸下,完美的身体不再是自然禀赋,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时间、金钱与情感的个人“项目”^[48]。健身产业顺势提供了实现这一神话的具体路径:课程套餐、智能器械与体测数据把“理想身材”量化为可达成的指标,这些指标又反过来强化了自我监控伦理,促使个体在“主动选择”中完成对商业规范的内化^[15]。之后,明星身体成为消费叙事的模范样本。例如,美国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塑造的“迈克尔·乔丹”硬汉形象,便将个人奋斗、英雄主义与耐克商品深度绑定^[49]。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经济与技术力量联手“生产”体育明星的身体,并借其信誉撬动全球消费市场。身体由此被再度阶层化:能够持续投资的群体以苗条、健壮或充满活力的外观彰显资本,而“过时、臃肿、病态”的身体则被标记为“不正常”,沦为消费社会中的“他者”^[15]。这具“充满不确定性”的身体——看似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实则不断接受新一轮的美学标准与道德评判^[10]。至此,外在规训、自我治理与符号消费在体育领域形成闭环:个人为了“看起来健康”而自

愿投入,消费体系则通过不断升级的身体神话维系自身的扩张。

体育社会学对建构主义、福柯规训理论与消费主义身体观的迁移,展现了权力如何在运动实践中完成由“他律”到“自律”、由“压抑”到“激励”的双重转向,也揭示了资本逻辑对身体形象与主体欲望的深度塑形。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田野发现反哺了身体社会学:它促使学界在原有结构—主体模型之外,引入“动机—体感—认同”^[50]等中观概念,为解释现代身体政治提供了更具质感与深度的分析框架。然而,这种思路往往将运动身体视为一种被动的建构对象,忽视了在运动实践中,主体能够积极塑造自身的体验与认同,以及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动态互动。这一局限性导致早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对运动身体的理解较为单一,缺乏对运动身体在更广泛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我赋权的深入探讨。

2.2.2 布迪厄理论的体育情境化阐释

首先,惯习理论成为理解运动身体在社会历史中形成与表现的重要框架^[51]。在体育领域,身体惯习是指行动者为了获得和提高某项技能,在运动技术与学习过程中,内化于身心的、持久的,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行为倾向系统^[52]。布迪厄认为身体惯习是“教养和教育的产物”^[53],惯习透过不同阶层的运动偏好直观地刻印在身体之上,强化了社会区隔^[54]。布迪厄早在《体育与社会阶级》一文中指出,体育运动选择是“阶级品味”的一个侧面^[53]。精英群体对高尔夫、赛艇等“悠游式”项目情有独钟,既符合其以身体为“展示对象”的审美取向,也契合其时间弹性与社交需求^[54];而工人阶层则更偏好篮球、足球、拳击等强调力量与对抗的项目,将身体作为“谋生工具”和情感宣泄口^[55]。这种差异不仅表达了对身体用途的不同理解,也在公共视野中被反复确认并放大了阶层鸿沟。

其次,身体资本概念的具体化应用。希林(Shilling)将身体资本定义为“通过康健、强壮和美善所获得的物质资源”^[10],而体育社会学研究则揭示了身体资本的可转化性在不同社会位置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对出身底层的竞技者而言,卓越的竞技成绩也许是少数能迅速累积经济资本的通道,但这一通道往往伴随高风险与高流失率——

伤病、短暂职业周期及市场波动皆可能让投资“归零”^[56]。相反,上层参与者虽不以经济回报为首要目标,却可通过“体面形象”“健康品味”等符号将身体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商务洽谈、社交网络与身份再生产中持续增值^[57]。由此可见,在布迪厄理论框架下,身体资本虽由个人肌肉、技能与风格构成,却始终嵌入阶层机会结构之中。

最后,体育场域作为社会结构的微观映射,其内部逻辑既反映又重构了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关系。惠顿(Wheaton)认为体育场域是关于“合法身体”定义权的象征性斗争空间,场域中的权力博弈决定了何种身体形象、训练逻辑和文化实践能够获得合法性^[58]。以奥林匹克场域为例,新兴商业资本与传统“业余主义”信条的冲突,实质是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长期解释权争夺^[59]。此外,场域的分化与自主化揭示了运动身体如何成为阶层再生产与文化抗争的关键媒介。不同运动场域通过着装规范、设备门槛和赛制设计划定边界——从精英高尔夫球场的仪式化着装到街头篮球场的装扮风格,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本逻辑^[60]。每项运动都构建了独特的“入口门槛”,个人及其代理人在身体资本评估中策略性地选择最有利的场域,通过培训和装备投入提升资本的可兑换性。场域的相对自主化最终以符号资本掩饰经济统治,如高尔夫被视为“高尚”,并非源于其技术,而是借由“高雅品味”这一符号遮蔽了背后的经济与社会资本^[61]。

综上所述,对布迪厄理论框架的体育情景化,使体育社会学能够立体地把握“惯习—资本—场域”的“身体”动态坐标:惯习将阶层品位沉淀进肌肉与姿态,资本转换揭示了不同社会位置的机会与风险不对称,场域斗争则呈现出象征权力的生成、维护与挑战机制。通过这一套分析工具,运动身体被界定为阶层再生产与文化抗争的关键媒介,也为布迪厄理论注入了更多情景化与实践性的经验维度。然而,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阶层区隔,忽视了其他重要的社会维度,如性别、种族和年龄。在体育研究领域,对身体性别、种族和年龄的关注拓展了布迪厄结构化理论的应用维度。例如,熊欢等^[52]的研究从女性健身实践者内部经验与视角出发,讨论了瑜伽和拳击这两种运动健身场域内女性的身体运动与性别规范之间的重合、错位与冲突,

揭示了运动身体实践对性别化身体秩序的挑战与重塑。又如,林金玉^[62]的研究指出,中国广场舞实践消解了性别、年龄和消费结构对老年妇女健身参与的限制,为社会资源的再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体现出自下而上的能动与结构性的互动过程。这些研究表明,体育社会学不仅在布迪厄结构化身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迁移与衍生,更为理解体育实践中性别与年龄等多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交叉视角(Intersectionality)。

2.2.3 具身理论的体育实践转向

“具身转向”在社会科学中强调:身体不是被动承载心智的器皿,而是知识、情感与行动的生成场^[3]。体育社会学将这一视角引入体育场、健身房与数据化训练平台,既检验了具身理论的解释力,也将来自一线实践的观察反馈至理论本身^[63]。这一过程揭示了运动技能、场地布置和技术装备如何通过肌肉记忆与感官经验耦合被“写进”身体^[64],从而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身实践。具身理论在体育世界主要经历了以下3条互为支点的实践化路径。

首先,体育社会学通过具身理论实现了身体主体性的理论重塑,使梅洛·庞蒂的lived body概念在体育实践中得到了具体阐释。克罗斯利(Crossley)^[36]在健身房研究中指出,运动增强了个体对‘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身体控制能力,从而改变了他们‘存之于世’的方式。这种具身认知超越了传统“心灵主导身体”的二元论,揭示了身体本身是认知与行动的主体。此外,休森(Hughson)等^[65]在足球研究中指出,体育运动不仅是一种身体的实践,也是一种空间的体验;运动通过具身经验审视身体如何在微观层面生产和重构日常生活空间。这一分析强调了运动场域中身体主体性的形成,揭示了运动者如何在具体环境中积极塑造自己的体验,超越了对“抽象空间”的传统关注。研究还发现体育运动激活了主体对生命意义的反思^[66],并强调了“具身”如何在“具地”(emplacement)中不断更新和重塑身体感知。这使得体育社会学能够将梅洛·庞蒂的“在场”概念具体化为赛场上的即时预判与决策行为。例如,当一名足球前锋在千分之一秒内判断来球的旋转方向时,他依赖的是整个身体的回应,而非仅仅依靠抽象理性的思维,完成了知觉与行动的闭环。也就是说,运动者在这一过程中通过

反思与调整唤醒自我意识,为“在场”概念注入可观察、可测量的知觉回路。正如艾伦·科林森(Allen-Collinson)^[63]所述,体育研究的具身性彰显了现象学的持续性承诺——凸显了在运动实践中身体主体性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体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塑造和重新定义自身存在的过程。同时,这种具身的认知体验深化了我们对运动如何影响自我感知和环境理解的认识,使主体性理论得到充分应用。

其次,运动赋权(Sport Empowerment)为具身理论的社会实践性提供了重要向导。在具身实践理论中,技艺的获得是通过重复与模仿沉淀为动作谱系^[67]。例如,举重选手通过数千次“拉—挺—蹲”的训练,将杠铃的重量、地板的摩擦声和教练的口令融入一种可随时使用的“实践脚本”。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身体如何通过具体操作将社会规则与文化期待转写为骨骼—肌肉层面的潜在能量,还验证了身体在增强个体力量和运动能力方面的重要性^[15]。运动因此成为了解身体、接纳身体并自由支配身体的最佳途径,为运动赋权奠定了具身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运动赋权不仅关乎对身体的掌控,它更是个体积极体验自我价值的过程,研究表明通过体育干预个体能够提升自我意识,增强自我效能感,从而行使自主选择权^[68],此外还能促进集体身份认同,突破身体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69]。因此,运动赋权过程不仅增强了个体层面的价值感,而且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创造了可能性,成为“体育促进发展”(Sport for Development)的具身实践途径。

最后,技术媒介的嵌入触发了“再具身化”的新阶段,展示了科技如何对身体经验与运动潜能产生深远影响。在数字化时代,各种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身体的边界不仅限于生物界限,而是与技术深度交织,为新型运动体验提供了可能性:如智能鞋垫、光学动作捕捉和可穿戴心率带并未削弱身体的中心性^[70],反而以“数据—感知”双向喂养的方式扩展了身体边界;实时振动反馈能帮助跑者调整步频,优化运动生物力学^[71];动作轨迹分析能快速协调专业舞者的身体重心^[72]。由是,罗梅罗—马丁内斯(Romero-Martínez)等^[73]认为技术介入能够显著提升运动员的身体感知和动作优化能力。同时,随着体感健身游戏的兴起,技术媒介的嵌入触发了“再具身化”的新阶段,如张华等^[74]在研究了体感游

戏《健身环大冒险》之后,提出体感健身游戏通过虚拟具身的健身形式和身体作为媒介的定位,改造了健身实践。正如德兰达(DeLanda)^[75]所指出的,技术与身体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集合体(assemblage),不再是简单的工具与使用者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这种网络开启了对未来运动技能和身体形象的再造可能^[76]。这些研究从多个视角揭示了技术不仅仅是外在的工具,更是身体感知与技能提升的关键中介,进而成为再具身化(Re-embodiment)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7]。这也映照了布莱多蒂(Braidotti)^[78]在后人类理论研究中强调的,技术介入不仅仅扩展了身体的物理边界,更重要的是重塑了身体的感知和潜能。这种理论视角挑战了传统的身体概念,将身体理解为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的系统,其边界通过与技术的持续互动而不断流动和重构。

总而言之,具身理论的体育实践转向并非单一话语的移植,而是“现象学的在场感—实践论的赋权导向—技术媒介的再具身化”3条理论脉络的交错展开。正是在这种交错中,身体被确认是知识的来源、权力的中心,也是持续创造新动作、新社群与新意义的发动机。体育社会学不仅将身体研究从抽象哲学思辨落实到具体运动情境,更通过“具身实践—结构对话”的辩证分析模式,突破了身体社会学的理论盲区。然而,这一理论框架在体育实践的应用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具身理论在探讨体育实践时,可能过于强调个体的实践经验,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对身体经验的深刻影响。这种局限性可能导致对运动参与者所处现实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解不够全面。其次,现有理论在跨文化的适用性上可能面临挑战,尤其是在不同地域和运动文化背景下身体实践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可能大相径庭。在中国语境下,本土化研究为具身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性拓展。例如,邱洁^[79]在其研究中探讨了阳明心学对太极拳的影响,分析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在太极拳中的具身化表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具身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兴起,李晓栋^[80]从身体、情感和空间3个维度探讨了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具身体验,揭示这3层面的体验如何提升体育参与的质量和群体认同感,这也与当代

中国体育的宏观目标和具身实践的微观体验之间形成了有机的联系。这些研究体现出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特色,进一步促发了具身理论在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时代背景下的再生。

2.3 研究范式的拓展:从感官体验、反身批判到实践干预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深入解构了传统社会学对身体的静态理解,还通过丰富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为身体概念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动态分析框架。该领域关注身体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实践,同时重视身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物质—文化”交织的动态系统。通过多元的研究范式,体育社会学拓展了身体研究的方法论谱系,从批判性理论分析、民族志调查到实践干预,构建了一种兼具反思性和经验性的研究路径。

2.3.1 运动感官民族志研究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感官转向”(the sensory turn)成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研究者不再仅限于视觉,开始重视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将这些感官视为探讨身体文化的重要切入点^[81]。如斯帕克斯(Sparkes)^[82]所述,感官研究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理解身体运动中感官经验的方式,将身体感知从被动的生理过程转化为主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生成机制。

运动感官研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3个关键方面。首先,它强调感官是社会文化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而感官实践揭示了肉体、情感和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关联。通过运动中的感官实践,研究者开始采用更加沉浸式的研究方法,将身体感知视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路径^[83],如陈海飞等^[84]用感官民族志对20名女性健身者进行深度访谈,归纳出女性健身者“痛”的酸爽、“轻”的愉快、“难”的努力、“汗”的舒畅、“热”的流动和“被看”的不适等6种主要的身体感,而这些“身体感”勾连起了现代社会文化、运动文化和性别文化对身体的新的界定^[50]。其次,运动感官研究强调具地性(embodied locality),认为感知方式深深嵌入特定的运动时间、空间和文化语境。在此认识论下,阿伦—科林逊(Allen-Collinson)等^[85]通过为期两年的联合自我民族志研究,生成了跑者对以下3个与具地性相关的视觉化主题:危险的地方、运动表现的地方、“时间—空间—地点”间的关系,这些地点与关系不仅影响跑者的感知体验,

还对其运动表现产生重要影响。最后,这一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传统民族志常常忽视身体感的深层知识,而新兴的感官研究通过整合参与观察、访谈和数字技术,实现了更为沉浸式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不再是冷静的观察者,而成为积极(actively)感知和参与的主体,通过重新思考、感受和体验,获得对体育文化的深入理解^[86]。

感官研究的转向,标志着身体研究从客观、静态的观察模式,转向动态、互动的理解范式^[86]。该方法论的革新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全面和立体地洞悉人类身体的复杂性,构建了一种互动的身体研究框架。

2.3.2 体育“反思性具身”(reflexive embodiment)分析范式的形成

反思性具身(Reflexive Embodiment)分析范式关注个体在身体实践中如何通过反思其身体经验来构建自我认同、理解社会关系以及与环境互动^[87]。这一概念不仅仅关注身体的物理变化,更深入地揭示了个体如何通过日常活动如刷牙,到更显著的身体改造如健身、文身等来构建和协商自我认同。例如,《作为生活方式的体育运动》一书就认为冒险登山者通过保持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来抵制商业化和理性化,追求对“真实存在”的体验,这不仅是身体实践,更是反思性具身的表现,是一种深层的自我反思方式^[88]。

反思性具身分析范式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方法论趋势,其范式特征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强调体验与身体感知,关注运动参与者在实践过程中的身体体验和感知如何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例如,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探索极限运动员如何在比赛中经历压力和兴奋,并将这些体验纳入其自我概念的构建中,从而深化对身份认同的理解^[89]。第二,促使研究者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体育活动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例如,针对特定社群(如女性和少数民族)的研究揭示了体育参与如何受到国家文化、性别规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这些群体如何在体育实践中不断重建和再塑个人身份^[90]。第三,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关注权力关系在体育实践中的运作。如研究者们通过将健身场所中的身体实践视为反思性具身分析的核心,深入探讨了权力关系的

微妙动态,批判性地揭示了身体在体育领域中协商、内化与反抗的复杂过程^[40]。第四,克罗斯利等^[91]提出了互动论(Interactionism)取向的反思性具身,强调具身互动的情感性维度,他们认为,反思性具身是在与他人的情感互动中不断生成和协商的。这一视角特别关注社交网络中运动身体实践如何通过情感互动重构身份认同^[92]。第五,研究者逐渐发展出新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诸如使用视觉方法记录身体实践或通过自我民族志深入参与者的体验。这些新工具有助于捕捉运动参与者的身体体验和社会互动,为研究提供更复杂的分析框架。

反思性具身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批判性的认识论立场,使研究者能够审视自身主观性、生活经验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93]。反思性转向(reflexive turn)要求研究者主动审视和质疑传统研究实践,承认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社会位置,从而在体育文化研究中建立更为批判和自反的理论视角。

2.3.3 物质身体文化研究(PCS)的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物质身体文化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范式,标志着身体研究从传统学科框架向更为开放、批判和实践导向的转变^[94]。这一研究范式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更是一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实践^[3]。

首先,PCS不仅仅描述身体实践,更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和社会不平等。这种研究立场特别关注“能动身体”(active body),强调身体不是被动的承受者,而是具有潜在变革能力的主体。通过与批判理论、身体哲学、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对话,PCS拓展了对身体的理解,将其视为社会政治力量的重要表达方式。其次,PCS拒绝“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明确将社会变革作为核心目标^[95]。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实践,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研究者关注从草根体育到政策制定的各个层面,试图通过改变身体实践来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变革。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PCS批判性地审视“超级体育”(uber sport)现象。高水平竞技和职业体育往往成为资本和权力规训的工具,导致运动员面临“辍学”“兴奋剂”和“身体物化”等问题^[94]。PCS的实践导向就是揭示这些问题,

并寻求可替代方案(alternative)。最后,PCS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方法论的创新性和多样性。研究者整合了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媒体分析、话语分析等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建立了以身体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范式^[94]。这种方法论特别强调“情境”(context)和“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的重要性。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阐释,而是深入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例如,对休闲运动的研究不仅关注运动本身,更关注参与者的身份建构和具体空间。通过这种方法,PCS将身体实践置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中。

综上所述,当代体育社会学通过物质身体文化研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构。这一范式以批判性视角解构权力机制,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以社会变革为导向,从民间草根体育的倡议到国际体育政策的制定,推动身体文化的实践转型;通过具身民族志、视觉分析等多元方法,重构了以身体为中心的整合性研究范式^[3],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研究从学术阐释走向社会干预。

3 结论与讨论:身体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理论互构的路径

在理论维度上,体育社会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社会学长时期面临的“结构—能动”二元对立困境,为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更立体的视角。通过将“运动的身体”确立为分析核心,体育社会学构建了一个整合微观实践与宏观结构的分析框架,呈现出建构主义、身体现象学与结构化理论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不同理论流派的相互影响。就建构主义的视角而言,个体身份和社会实践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强调“运动的身体”使研究者能够关注身体实践在社会交往中构建和再现社会意义,超越单纯的结构性分析。身体现象学进一步强调身体经验对个体实践的影响,认为身体不仅是行动的工具,也是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础。将“运动的身体”置于分析中心,使研究聚焦于身体感知和情感对社会互动的影响,帮助我们理解身体经验如何塑造个体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模式。结构化理论则强调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的相互作用,认为个体的行动受制于社会结构,但又能反过来重塑这些结构。通过将“运动的身体”作为中介,研究不仅能揭示个体在体

育实践中的能动性如何受到宏观结构的影响,还能展现社会结构在微观实践中的松动与变化。这3种对立与互补的理论关系形成了一个更综合地理解身体的框架,逐渐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应用。例如,在《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一书中,研究者运用具身理论与结构化身体理论的双重视角,构建了“具身—结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保留了现象学对主体经验的敏感性,克服了个体主义的局限;同时吸纳了建构主义对权力机制的深刻批判,通过分析健身实践中的“战术性反抗”案例,修正了传统结构决定论的机械性解读。这种理论融合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体社会学解释范式,为理解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与市场化改革语境下的身体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总之,基于“运动的身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使社会学理论从抽象命题转向具体实践,为理解社会动态机制提供了敏锐视角,同时反映了不同理论流派在研究复杂社会现象时的互补性,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

就研究范式而言,首先,在认识论层面,体育社会学克服了身体社会学长期存在的实践盲区。传统社会学对“静态身体”的单一解读被打破,转向一种更具动态性和实践敏感性的社会分析路径。其次,在方法论层面,体育社会学对具身实践的反身性研究方法的开拓,微观民族志和运动感官叙事的结合,以及社会变革为导向的方法论倡导,不仅丰富了社会学研究的工具箱,也为理解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更立体的分析路径。最后,在实践批判层面,体育社会学深入揭示了身体实践中权力、性别、种族、阶级等社会微观政治运作,论证了体育实践作为社会干预和结构性革新的重要机制。这一研究策略也揭示了社会变革不仅发生在宏观制度层面,更深刻地蕴含于日常身体实践的微观政治中。此观点亦回应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使命:不仅要阐释世界,更需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社会进步。以实践为导向的体育行动研究课题在我国不断涌现,从体育锻炼对公共健康的干预性行动研究^[68],到对乡村体育的社会赋能性行动研究^[69],再到社区体育的微观治理行动研究^[96],这些研究体现了本土化研究和实践研究范式的成果,为观察、分析以及积极介入社会变革提供了机遇,也反映了体育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身体社会学与具体的体育实践相结合时,需要构建一个更为灵活、开放的理论模型,超越既有的身体结构决定论和主体本质主义,促进传统分析框架的理论再生产。具体而言,理论互构可以从3个维度展开。首先,将“运动的身体”确立为连接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建构的关键中介变量。这一视角打破了自然与文化、生物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97],使我们能够更动态地、情景化地理解身体的社会生成过程;其次,通过体育参与者的身体叙事,揭示规训与反抗的复杂博弈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并非被动接受社会规范,而是通过创造性的身体实践不断协商和重构社会边界;最后,建立“具身体验—运动惯习—社会结构”的多层级分析模型,这一模型使身体社会学实现从“解释性理论”向“实践性方法论”的范式转型。

通过这一理论互构,可以突破传统社会学对身体的解释局限,使体育实践不再仅仅是文化现象,而是理解现代性、社会变迁和权力运作的关键透镜,为重新思考身体、实践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对运动身体的细致考察不仅能够更好地解读社会,也为科研、学者主动介入和改变社会提供了可能,与社会学追求的学术理想与社会责任相契合。

参考文献:

- [1] 熊欢,朱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演变与未来展望:从理论、方法到实践的综合回顾[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44(3): 1-12.
- [2] 熊欢.学科特质、学术困局、学理拓展:体育社会学之变局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 8-19.
- [3] 熊欢.从社会身体到物质身体的回归——西方体育社会学身体文化研究的新趋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8): 113-121.
- [4]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 [5] 熊欢.身体、社会与运动:体育社会学理论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 [6] 熊欢.性别、身体与社会:女性体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7] 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M].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 [8]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9] RICHARDSON N. and LOCKS M. Body studies: The basic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0]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汪民安, 陈永国.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NANCY J-L. Corpus[M]. Paris: Métailié, 1992.
- [13]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4] 欧文·戈夫曼, 黄爱华.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15] 熊欢. 凡身之造: 中国女性健身叙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 [1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17] 李洋, 戴国斌, 段丽梅. 野蛮与文明: 埃利亚斯体育竞技核心理路梳理与价值反思[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1): 72-77.
- [18] CSORDAS T J.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 SMITH J E H. Embodiment: A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0] CROSSLEY N. Merleau-Ponty, the elusive body and carnal sociology[J]. Body and Society, 1995, 1(1): 43-63.
- [21] 张连海. 感官民族志: 理论、实践与表征[J]. 民族研究, 2015, 2: 55-67, 124-125.
- [22] FARNELL B. Dynamic embodiment for social theory: I move therefore I a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23] LEDER D. The absent bod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24] LEDER D. A tale of two bodies: The Cartesian corpse and the living body[M]. Springer, 1992.
- [25]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6] TOMLINSON A.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sport: habitus, capital and field[M]//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27] GRENFELL M.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M]. Routledge, 2014.
- [28] 熊欢, 张爱红. 身体、社会与体育——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体育[J]. 体育科学, 2011, 31(6): 81-86.
- [29] HARGREAVES J, VERTINSKY P. Physical culture, power and the body[M]. London: Routledge, 2007.
- [30] COLE C L, ORLIE M. Hybrid athletes, monstrous addicts, and cyborg natures[J].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1995, 22(3): 228-239.
- [31] ANDERSON E. Sport, theory and social problem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Routledge, 2018.
- [32] BEAMISH B, RITCHIE I. Fastest, highest, strongest: a critique of high-performance spor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33] HARGREAVES J. Sport, power and cul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6.
- [34] PIGGO L.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resistance in the boxing gym: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D]. University of Brighton, 2013.
- [35] HOWE D. Sport, professionalism and pain: ethnographies of injury and risk[M]. Routledge, 2004.
- [36] CROSSLEY N. In the gym: motives, meaning and moral careers[J]. Body & Society, 2006, 12(3): 23-50.
- [37] 刘舒姣. 目光、权力和身体——以青浦N健身俱乐部为例[D]. 上海: 上海大学, 2006.
- [38] BLACKSHAW E, CRABBE T. Leisure life: myth, masculinity and modern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39] RAIL G. The wellbeing imperative: on bio-others, rescue mission and social justice[C]//ISSA 2015 World Congress Book of Abstract, Paris Descartes University, Paris, 2015.
- [40] 熊欢, 李康壮. 当代中国健身文化中男性气质的自我呈现与主体建构[J].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8(8): 27-38.
- [41] SHILLING C, BUNSELL T. From iron maiden to superwoman: the stochastic art of self-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iant female sporting body[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14, 6(4): 478-498.
- [42]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43] COLE C L. Resisting the canon: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sport,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body[J].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1993, 17(2): 77-97.
- [44] RAIL G, HARVEY J. Body at work: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sociology of sport[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5, 12(2): 164-179.
- [45] 熊欢. “自由”的选择与身体的“赋权”——论体育对女性休闲困境的消解[J]. 体育科学, 2014, 34(4): 11-17.
- [46] CHAPMAN G E. Making weight: lightweight rowing, technologies of power,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7, 14(3): 205-223.
- [47] HORNE J. Sport in consumer culture[M]. Sport in consumer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48] GILL R, HENWOOD K, MCLEAN C. Body projec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normative masculinity[J]. Body & Society, 2005, 11(1): 37-62.
- [49] ANDREWS D L, JACKSON S J. Sport sta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porting celebr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50] 陈海飞, 熊欢. 运动、“身体感”与文化: 一项女性健身感官民族志研究[J]. 体育与科学, 2023, 44(3): 34-41.
- [51] WACQUANT L. Body and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2] 熊欢, 王阿影. 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1): 49-58.
- [53] BOURDIEU P. Sport and social clas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8, 17(6): 819-840.
- [54]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London: Routledge, 1984.
- [55] JARVIE G, MAGUIRE J. Sport and leisure in social

- thought[M]. 2002.
- [56] WACQUANT L. J. D. Pugs at work: bodily capital and bodily labour among professional boxers[J]. *Body & Society*, 1995, 1(1): 65-93.
- [57] HUTSON D J. Your body is your business card: bodily capital and health authority in the fitness industry[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90: 63-71.
- [58] WHEATON B.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ifestyle sports*[M].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 [59] MAGUIRE J. *Reflection on process sociology and sport*[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60] GIULIANOTTI R. *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2012.
- [61] BOURDIEU P. *Sociology in question*[M]. English: Sage, 1993.
- [62] 林金玉. 我国老年妇女健身活动社会支持及其网络建设研究[D].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 2022.
- [63] ALLEN-COLLINSON J. Sporting embodiment: sports studies and the (continuing) promise of phenomenology[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and Exercise*, 2009, 1(3): 279-296.
- [64] PURSER A. "Getting it into the body": understanding skill acquisition through Merleau-Ponty and the embodied practice of dance[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2018, 10(3): 318-332.
- [65] HUGHSON J, INGLIS D. Inside the beautiful game: towards a Merleau-Pontian phenomenology of soccer play[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002, 29(1): 1-15.
- [66] 熊欢, 何柳. 女大学生户外徒步运动体验的口述研究. *体育与科学*, 2017, 38(4): 63-70.
- [67] GROSZ E.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8] 熊欢. 社会学视域下育龄妇女健康体育干预的综合效应与社会机制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1): 80-91.
- [69] 林金玉, 熊欢. 农村妇女健康促进的体育行动与策略——基于广东省清远市J村妇女的行动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1): 9-19, 39.
- [70] NELSON E C, SOOLS A M, VOLLENBROEK-HUTTEN M M R, et al. Embodiment of wearable technology: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JMIR mHealth and uHealth*, 2020, 8(11): e16973.
- [71] WILLY R W, DAVIS I S. Real-time gait retraining with wearable vibrotactile feedback reduces knee loading in runners[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21, 53(8): 1644-1652.
- [72] BLÄSING B, CALVO-MERINO B, CROSS E S, et al. Dancers' expertise modulates movement simulation during dance observation[J]. *Cerebral Cortex*, 2012, 22(5): 1118-1129.
- [73] ROMERO-MARTÍNEZ A, GONZÁLEZ-ROSA J M, RODRÍGUEZ-BAILÓN R, et al.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and embodied cogni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otor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sport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567711.
- [74] 张华, 肖国庆. 虚拟具身与身体为媒: 体感技术介入后的健身实践[J]. *青年记者*, 2024(7): 107-112.
- [75] DELANDA M. *Assemblage theory and the body: technology, affect, and embodiment in the digital age*[J]. *New Formations*, 2016, 88(1): 95-112.
- [76] BRYANT L, SRNICEK N., HARMAN G.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M]. Melbourne: re.press, 2011.
- [77] DE PREESTER H.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the (im) possibilities of re-embodiment[J].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10, 16(2-3): 119-137.
- [78] BRAIDOTTI R. *The posthuma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 [79] 邱洁. 阳明心学对太极拳的影响及具身化研究[D].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 2020.
- [80] 李晓栋. 身体、情感与空间再造: 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具身体验——基于6个城市社区的田野考察[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4): 87-98.
- [81] SPARKES A. C. *Seeking the senses in physical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82] 余舜德. 体物入微: 物与身体感的研究[M]. 台北: 清华大学, 2012.
- [83] HOCKEY J, ALLEN-COLLINSON J. Grasp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sporting bodi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07, 42(2): 115-131.
- [84] SPARKES A. C., SMITH B. Chapter 8 Embodie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seeking the senses in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a fleshing out of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C]//Leed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 [85] ALLEN-COLLINSON J, HOCKEY J.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Sensory Phenomenological Envisionings of Running Space and Place[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013, 44(1): 63-83.
- [86] 韦晓康, 熊欢. 论民族体育志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新趋势[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9): 112-119.
- [87] CROSSLEY N. *Reflexive embodi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8] WHEATON B. *Understanding lifestyle sports*[M]. Routledge, 2004.
- [89] SPARKES AC, SMITH B.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 From process to product*[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90] CLARK A, HOGEVEEN B R. Exploring women's embodied experiences of 'the gaze' in a mixed-gendered UK gym[J]. *Societies*, 2017, 8(1): 2.
- [91] WASKUL D D, VANNINI P. *Body/embodiment: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M].

- England: Ashgate, 2006.
- [92] PAGIS M. Embodied self-reflexivity[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9, 72(3): 265-283.
- [93] PRINGLE R, THORPE H. Theory and reflexivity[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94] SILK M, ANDREWS D, THORPE H.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95] SILK M L, FRANCOMBE J, ANDREWS D L. Slowing the social sciences of spor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physical culture[J]. *Sport in Society*, 2013: 1-24.
- [96] 李晓栋, 张靖. “社区能人”推动社区体育治理的行动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X社区体育自治的个案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4, 38(5): 23-32.
- [97] 熊欢. 论质性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消解[J]. *体育学刊*, 2018, 25(1): 1-9.

Intersections and Co-construction: Reproduction and Paradigm Expansion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Guided by Sports Sociology

XIONG H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body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medium for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dynamics.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expand or even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ology centered around the core dimension of “the body”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issue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isciplin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interactive evolution between the sociology of sport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t explores how the sociology of sport transcends theoretical blind spot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to achieve theoretical reproduction and paradigm expans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body in sport” has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micro-practice and macro-structure. This approach shifts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theoretical concepts to embodied practices, offering a sharp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dynamics. Furthermore, the sociology of sport expands the methodological repertoire of body studies by encompassing critical theoretical analysis,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 thereby constructing a reflex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pproach, and provides 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sport, bodily techniques, and social culture.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dimensions for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first, establishing the “body in sport” as a key mediator linking biologic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reby overcom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biology and society,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econd, revealing the intricate dynamics of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through athletes’ bodily narratives, emphasizing individuals’ agency and creativity, and third, developing a multi-level analytical model of “embodied experience—sporting habitus—social structure,” facilitating a paradigm extension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This theoretical synthesis achieves the paradigm expansion of body sociology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futu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ocial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the body; theoretical reproduction; sporting habitus; social structure